

《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淵源

◎ 姚禮明

教育在人類發展史上，尤其是在當今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的重要性，怎麼評估都不為過。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教育就沒有人類的今天，當然也不可能有人類的明天；我們還可以說，有無有意識的學習與傳承，也即教育，更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最重大、最根本的區別之一，……等等。然而，教育並不神秘，它就在我們身邊。如果我們對教育作一個寬泛的理解，而不拘泥於它的現代形式，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種「經驗的傳遞」¹，那麼，祭祀和布道應該是人類最早的公共教育方式，而廟堂和祭拜場所則是人類最早的公共學校。事實上，根據考古發現，人類最早的、有一定規模的公共教育事業，就是所謂的「祭司教育」，它大約是出現在四千年前的兩河流域²。由此可見，宗教與教育之間的天然聯繫就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當中，基督教³與現代教育體系，尤其是與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之間的歷史淵源，又是人類所有其他宗教所不可望其項背的。本文對《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之間的歷史淵源作一點粗淺的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一 《舊約聖經》與希伯來人重視教育的傳統

宗教起源於人類的生存需要，這已經是不刊之論；《聖經》的成書與基督教的產生則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現存被基督教會確認的《聖經》正典主要由《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兩部分組成⁴。《舊約聖經》的歷史比基督教自身的歷史還長，它來自於古代希伯來人；而《新約聖經》的成書則與基督教產生的早期歷史結伴而行。

《聖經》，尤其是《舊約聖經》，究竟成書於何時？它的作者又是誰？人們對這樣的問題感興趣是非常自然的。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者已經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研究了千年以上，至今仍然還在研究，而且還不斷地有新發現、新見解，甚至形成了新的知識門類，例如哲學解釋學。

《舊約聖經》原本是希伯來人猶太教的經典，而早期的基督教也只不過是猶太教的一個非正統的支派。因此，基督教奉《舊約聖經》為自己的正典是很正常的，如果這樣做最初只是一種生存與發展的策略需要的話，——就這一點而言，基督教的創始者們做得非常成功！——那麼後來則更成為其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即使在有了自己的《新約聖經》以後，基督教也一仍舊慣，只不過為了與《新約聖經》銜接，對《舊約聖經》在內容和編排上動了一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手術。這也就是《舊約聖經》的歷史比基督教自身的歷史還長的原因所在。

毫不奇怪，《舊約聖經》中有很多關於希伯來人的歷史記載。在古代，正如美國學者S·E·佛羅斯特所說的那樣：「對於希伯來人來說，宗教就是他們的全部生活。」⁵因此，《舊約聖經》就和希伯來人的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儘管「對現代學者來說，寫一部可信的希伯來人早期的歷史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從收集的民間傳說、傳奇、詩歌、戲劇以及誇大的英雄偉人故事、道德故事和實際發生的事件報導中，現代學者力圖形成一部希伯來歷史。」⁶

翻開這部歷史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文明奮鬥史，也是一部民族流浪史⁷，還是一部獨特的把宗教、法律與教育融合在一起的歷史。

大約是在五千多年以前，希伯來人就開始有了上帝崇拜，只不過這時候的上帝還只是一個名叫耶和（Yahu）的迦南雷神，是希伯來人諸神中的一位，沒有獨尊地位⁸。後來，耶和更名為耶和華（Jehovah），還在耶路撒冷建起了專門的神殿，並逐漸成為希伯來人獨一無二的全知全能的上帝。這就是至今仍在延續的猶太教。

現在已經很難準確考證，希伯來人重視教育，尤其是兒童教育的傳統來自何處。但是至少是在西元前十二世紀，也即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希伯來人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正規學校。而在此之前，儘管沒有正規學校，重視兒童教育的傳統也已經存在。S·E·佛羅斯特在描述希伯來人西元前十二世紀以前的教育狀況時寫道：「生活本身就是兒童的學校和教師，兒童通過集體生活和參加集體生活進行學習；長輩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傳授給兒童。另外，長老還有計劃地讓兒童瞭解作為一個成年人所負擔的責任和享有的權利。整個教育內容包括一些必須熟練掌握的技術、狩獵的技能、獲取食物的方法、巫術和一些民間傳說。這一時期的整個教育是實際的，它和自然及社會環境中的生活有緊密的聯繫。」⁹

到西元前5世紀，在所有《聖經》典籍中內容最古老的《舊約聖經》中的「律法書」，也被稱作「摩西五經」的已經成書，「並且成為希伯來人教育內容的核心。學生們用希伯來語背誦它的大量內容，傾聽老師的講解，討論它表面的和內在的含義。不久，希伯來的兒童教育就以此書為課本。」¹⁰

大約到西元一世紀，希伯來人已經建立起一個由學前教育（以家庭為單位）到小學教育（教堂小學），由小學到中學（主要是法律學校），再到更高級的學校（沒有固定的形式），這樣一個相對完整的全民教育體系，並且通過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實行強制性的初等義務教育：「在每一個地區和每一個城市都要為兒童任命教師，年滿六歲的兒童必須入學。」¹¹

這種把宗教、法律與教育熔於一爐的做法，確實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創造！S·E·佛羅斯特滿懷深情地寫道：「在研究希伯來歷史的時候，在很多方面會對如下事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的生活完全是為了未來；他們曾失去了自由，在自由時期他們編寫和留下了他們的歷史；他們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一本書（《聖經》）和一個宗教；在若干世紀中，他們能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組成一個整體；他們塑造了一種教育能把這個傳統、這本書和這個宗教傳授給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甚至在現代，儘管希伯來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並且繼承了異族文化，但他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喜好。他們有自己的禮拜堂，自己的經典，自己的神。正是這些東西把各地的希伯來人聯繫在一起，這是歷史中的一個奇跡。」¹²

二 早期基督教與教育

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是個希伯來人，而且是個虔誠的猶太教徒，這是充滿了爭議和虛幻的基督教的歷史上最確鑿、最沒有爭議的公論。「早期的基督教是從猶太教中產生的，最初這個運動的皈依者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新約常提到基督徒在猶太的地方會堂講道。在外人——例如羅馬當局——看來，這兩個運動如此相似，以致他們把基督教看作是猶太教中的一個教派，而不是一種獨特的新運動。」¹³

儘管大約在西元一世紀後半期，基督教逐漸有了自己的崇拜物件和經典，於是便從猶太教中獨立出來；但是，基督教不僅繼承了希伯來人幾乎所有的優點：一本書——《舊約聖經》、一個一神宗教，以及重視教育的傳統，等等；而且還消化、吸收了古希臘哲學和古羅馬文化的一些營養，克服了希伯來人的致命弱點：把一個單一民族的排他性的宗教改造成一個可以包容所有人的普世性宗教，從而對人類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其中包括對人類教育事業的貢獻。

根據希伯來人的宗教觀念，希伯來人的歷史還是一部獲得上帝拯救的歷史。在他們看來，《舊約聖經》就忠實地記錄了這些被拯救的故事。因此，《舊約聖經》的主題就是論述上帝與希伯來人之間的關係，目的是使上帝與猶太教取得合法性。應該說，《舊約聖經》的創作者們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耶穌及其門徒們非常聰明地繼承了希伯來人的成功，從而免去了重新論證上帝的合法性這一苦差事。也正因為這樣，當愚笨、率直的馬西昂要愚蠢地斬斷《舊約聖經》與基督教的連續性的時候，結果只能是馬西昂於西元144年被開除出基督教。

既然上帝的合法性已經無可置疑，那麼，只要證明耶穌基督是上帝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上帝本人，基督教的合法性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證明。而這正是《新約聖經》要完成的歷史性任務。應該說，《新約聖經》的創作者們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也已經被歷史事實所證明。於是，翻開《聖經》我們可以看到，《舊約聖經》的核心是上帝；《新約聖經》的核心則是耶穌，而根據基督教的神學觀念，上帝和耶穌是可以合一的，所謂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而這一點正是基督教與猶太教最根本的區別之一，也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基督教是在猶太教的擠壓和羅馬帝國的迫害的雙重逼迫下成長起來的，充滿了苦難和曲折。不僅耶穌被釘上十字架，而且他的十二個最傑出的門徒中有多人被下獄，甚至被迫害至死。至於一般信眾的遭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但是，基督教不僅沒有被壓垮，反而愈戰愈強，愈戰愈勇，靠的是甚麼？檢索基督教的早期歷史，如果剔除其神秘主義色彩，從無神論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早期基督教最強有力的武器不是上帝，不是組織，更不是暴力，而是宣傳、教育，即布道。耶穌的核心事蹟就是布道，十二使徒實際上就是耶穌最親近的十二個學生；而《新約聖經》的核心內容也就是對耶穌及其學生布道的記錄。因此，無論是從希伯來傳統來看，還是從基督教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看，基督教重視教育都具有某種先天性。所以，阿爾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說：「幾乎很少有人對耶穌是一位元迄今為止我們認識的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師這一事實提出疑問。他使用的言詞、比喻以及人類生活的例子，無論是他的朋友或敵人都為之震動。……有人曾說過：『即使基督離開人間時沒有預備任何人繼續他的工作，他仍是曆世歷代最偉大的老師，他的生活和榜樣，仍對整個教育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廣的影響。』」¹⁴先知與傳教士則成了人類最早的專職教師。

大約在西元前四世紀，西方世界進入希臘化時期。希臘化對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到西元前200年為止，大多數猶太人，包括許多祭司的家族，都被希臘文化所征服。……正是大祭司吉生（High Priest Jason）——他的希臘姓名，表現了他對希臘文化的傾心——應對下述情況負責。『因為他熱切地創辦了一座體育館，並使得最高貴的青年們追求仿效希臘精神，因此產生了一種極端的希臘風尚；而且，由於吉生不敬神，招來了一種外國宗教，所以他被稱作罪孽深重的人，並被褫奪了大祭司的職位。』這裏提到的希臘體育館，不僅僅是一個鍛煉的場所，而且是年青人的一所學校。這座體育館的創立，真正意味著希臘教育方法已傳入猶太人之間。……饒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猶太人力圖把他們自己從希臘文化的征服拯救出來時，竟為他們的兒童採用了希臘的學校制度，並為其青年們採用了希臘的辯論風尚。由於使用希臘的教學方法，一個東方民族成功地從希臘影響下獲得自由，這正是希臘文化巨大能力的一個顯著鐵證。」¹⁵

希臘化對早期基督教在教育方面最重大的影響是教義問答學校的建立。基督教第一所教義問答學校創辦於西元二世紀後期埃及的亞力山大城。當時的亞力山大城是那時候西方世界的文化傳播和學習中心。在這裏有當時西方世界最好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學校和教堂，其中包括一座基督教的教堂，匯聚了當時西方世界最傑出的教師、傳教師和學生；這裏還雲集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學者，有希臘哲學家、猶太學者、東方神秘主義者、無神論者、科學家以及奇特教派的宣教者。正是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和思想觀念的激蕩中，基督教需要為自己的信仰辯護，由此導致了第一所基督教教義問答學校的誕生。隨著形勢的發展，這所教義問答學校的課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漸地，學校課程從單一的宗教與教義內容擴充到各種學科，構成了普通教育體系——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東方的信念認為古典主義學問是深入理解基督教的基礎，忠實於此，學校開設了除伊壁鳩魯主義外整個希臘哲學體系的課程，包括形而上學、倫理學、邏輯、物理學、幾何、天文、解剖學、神學、教義說和教堂禮拜儀式的解釋。還有一個高級課程是《聖經》注釋。」¹⁶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教義問答學校遍布各地，但亞力山大城的這所教義問答學校一直是基督教學者的主要學習中心和其他同類學校的典範。

對於教義問答學校在基督教發展史上和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西方著名教育史家博伊德教授在他的傳世之作《西方教育史》中寫道：「教義問答學校的影響巨大而深遠。通過它，基督教第一次在全世界文化中成為一種肯定的因素。同時它本身採納了希臘的科學和哲學方面一切最好的東西。……就是在西方，教義問答學校甚至對像奧古斯丁那樣的神學家們的思想，也產生了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使調解教會和學術之間的矛盾並把古代的文化推進到中世紀變得容易些。……甚至在歐洲黑暗時代已經來臨以後，教義問答學校學術的光輝，繼續在燦爛地燃燒著。在這一點上，一個特別有趣的事實是，人們可以探索出一條直接連續的路線，它從亞力山大城經過安提阿（Antioch）和埃德薩（Eedessa），到尼西比斯（Nisibis）的聶斯托裏學校（建於489年）。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從聶斯托裏學校轉到伊斯蘭教學者手中，在那裏他們被珍藏到12世紀和13世紀，然後又返回歐洲。」¹⁷

由此可見，教義問答學校不僅無意中為西方的文藝復興預做了準備，而且也成為後來基督教的修道院和中世紀大學的先聲，尤其重要的是，教義問答學校設計的一些課程和教學方法，更在其後的修道院和中世紀大學裏直接得到延續。

三 從修道院到中世紀的大學

說到歐洲的黑暗時代，就不能不提基督教的修道院。正如克里斯多夫·道森所說的那樣：「對中世紀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免地要給西方修道院制度的歷史以重要地位，因為，在從古典文明的衰落到十二世紀歐洲各大學的興起這一長達七百多年的整個時期內，修道院是貫穿於其中的最為典型的文化組織。」¹⁸

大約在西元四世紀，隱修生活成為一種風氣。「模範基督徒不再是被拖到羅馬競技場上在野獸面前勇敢無畏的主教。他現在是孤獨的隱士，生活在被人遺棄的埃及曠野抵抗魔鬼。」¹⁹

在這些隱士之中不乏富家子弟。被視為基督教第一修士的安東尼就是一位富家子弟，他在二十歲時根據《聖經》中耶穌的教導，放棄了自己的萬貫家財，志願地過一種隱修的生活。因為安東尼的行為完成了一件在耶穌看來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的事情，超越了《聖經》中的記載²⁰，很有感召力，使成千上百的人仿效他。事實上，由於「羅馬帝國的環境對基督教徒來說日益惡化，有些人發現在通常環境中無法生活下去，似乎到處都是腐化與邪惡。帝國政府強加的沉重的稅收與嚴格的紀律、公共道德的缺乏、不能承受的緊張，這一切驅使一些人逃至山中或沙漠裏獨居以躲避誘惑。」²¹這樣一來，「外在世界的誘惑被內在世界的誘惑所取代，其中有：驕傲、爭鬥和褊狹。在埃及和敘利亞，許多修士相當極端，忍耐各種艱苦的生活。有些人只以野草為生，有人住在樹林裏，還有人拒絕洗澡。」²²

隱居的最初形式是獨居。但是隱士們發現，群居比獨居更能有效地實現自己的宗教目的。西元320年，帕科米烏（Pachomius，約290–346年）²³組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修道集團；三年後，他寫了一本用來管理修士生活的《章程》，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根據帕科米烏制定的《章程》，修道院在院長的絕對領導之下，修士們的工作、學習、禮拜，以及休息和就餐都有規定，都要按部就班地進行。修道院從此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軌道。到帕科米烏去世時，他已經設立了九座修道院，一座修女院，有三千多人在這裏隱修²⁴。

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隱修形成一種潮流，影響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修道院也由埃及而遍布西歐各地。「修士們復興了基督徒的熱情以及早期處境艱難時代的虔敬。他們將殉道士的精神轉換為最終完全獻身於神以及以禁欲的方式效仿基督。……在五、六世紀，每個教會領袖要麼自己就是一位修士，要麼與隱修制聯繫密切。」²⁵

由於外族入侵及羅馬帝國崩潰，歐洲處於一盤散沙的境地。而一統天下的基督教會也由此發揮了準政府的作用，成為歐洲的主宰。「在五世紀和六世紀侵略時期，教會承擔了許多先前由羅馬帝國履行的政治職責，並繼續改變日爾曼部落的信仰。通過宣揚一種較高的道德，教會馴化了日爾曼民族的勇武習性。通過保持希臘和羅馬的部分高度文化，使日爾曼人開闊了視野，接受了新思想。當羅馬帝國崩潰之時，教會充當了一個使信仰統一、使社會文明的代理人，並賦予人們明確的、有目的的生與死的概念。在一個垂死的世界，教會是唯一能夠重建文明生活的機構。」²⁶

西元五十一世紀，西歐教育的主體是基督教教育，就連世俗的宮廷教育也帶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在這被史家稱之為「黑暗時代」的日子裏，修道院成為最重要的承先啟後的文化組織。在這當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貢獻最為傑出。

西元480年，本尼迪克特出生於義大利一個貴族家庭。由於無法忍受當時的邪惡，本尼迪克特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過隱修生活，並成為著名的修士。在他四十九歲時，他在距離羅馬東南

八十五英里的卡西諾山上修建了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這就是著名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本尼迪克特也把自己的餘生全部貢獻給了這座修道院，直至542年去世。在他的傑出領導下，修道院的組織建設和基督教的隱修制度都有了革命性的重大發展。因此，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成為所有修道院中的最佳模範，而本尼迪克特本人則被尊稱為西方隱修制之父。「到九世紀末，僅高盧地區先後建立了數百所本尼迪克特派的修道院，成為西歐一股巨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²⁷

關於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在西方文化傳承中的歷史地位，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評價值得重視。他說：「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加洛林王朝時代以及在它前後的幾個世紀中，中世紀早期不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誠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發展上都帶有修道院領先的痕跡。它們被稱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特時代，因為上自七世紀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諾薩布裏亞的興起，下迄十二世紀城市生活的復蘇和公社的興起，較高層次的文化的連續性在西歐，在作為知識和文學創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維持。」²⁸

具體說來，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他特別強調紀律的重要性。他認為，沒有嚴格的紀律，隱修就會流於形式，而修士也並不會比流浪漢好多少。因此，在他為修道院制定的《管理條例》——也有譯作《會規》或《教規》的，筆者注——中，對修士生活二十四小時中的每時每刻都有嚴格規定。但是他也認識到，嚴酷的制度不是每個人都能長期忍受的。所以，修士在見習期間可以隨時離開；但一旦成為修道院的正式成員，就必須嚴格遵守紀律。

第二，本尼迪克特還特別強調勞動的重要意義，而他的勞動概念包括心智和體力兩個方面。他在《管理條例》裏說：「懶散是對靈魂的敵視，因此，兄弟們應當在固定的時間專注於體力勞動，在明確規定的時刻專注於宗教閱讀」；²⁹他認為，「對於修士來說，在院牆外四處遊蕩是巨大的精神危機。」³⁰體力勞動不僅具有道德價值，而且具有經濟意義，因為很明顯，修道院要長期維持，必須能夠自給自足。所以，「修士編織自穿的衣服，釀造自飲的酒，自己就是木匠和泥瓦匠。」³¹

第三，比上述兩點對後世影響更大的則是圖書館的建立。「丹尼爾·布林斯廷（Daniel Boorstin）說聖本尼迪克特被稱為『圖書館之父』。在本尼迪克特會的很多修道院裏創建了一種精細的圖書館系統；他們收集各書籍，在寫字間複製手抄本，把書出租給別的修道院，而且要求修士每日讀書。在本尼迪克特會的圖書館藏書包括《聖經》、教父的著作、聖經注釋以及希臘羅馬作者寫的非宗教書籍。圖書館對於這個修會是如此不可或缺，修道士們甚至稱圖書館為修道院的軍械庫，類似於城堡裏的軍械庫。」³²

對於基督教的修道院和圖書館，佛羅斯特寫道：「修道院中的一個主要教育設施是圖書館。大多數修道院都強調修道士們理智的連續發展。在生活計劃中，規定修道士每天要用一定的時間讀書學習，其結果，在修道院中造就了許多當時最卓越的學者。除了很少幾個例外，西歐數百年的先驅思想家們都是修道院成員，都是從修道院中教育出來的。」³³

在教宗和世俗政權的支持下，修道院從純宗教教育擴張到普通教育。西元六世紀以後，修道院也開始開辦學校，招收俗家弟子，可以住讀，稱之為「內修」；也可以走讀，稱之為「外修」。修道院的課程設置也愈來愈規範。在課程設置方面，古希臘時期的學園和希臘化時期的教義問答學校成為修道院的楷模。「修道院學校的課程是『七藝』。七藝是古希臘、羅馬

的傳統課程。在希臘時代，柏拉圖提倡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加上智者們的教學科目文法、修辭、辯論術，這七門課程在古希臘後期已逐漸成為學校普遍教授的科目。到羅馬共和時期以及帝政時期，學校的教學科目基本上繼承了希臘傳統，不過在不同時期、不同學校所教授的科目有多有少。到六世紀左右，卡希歐多爾（西元480-575年）在《神學與世俗學導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七藝』這個名詞，將古代羅馬學校設立的課程文法、修辭、邏輯這『三藝』，與算術、幾何、音樂、天文這『四藝』合併為『七種自由藝術』，並強調世俗文獻對於基督徒也具有重要意義，『七藝』成為中世紀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礎。」³⁴

根據西方學者研究，現在遍布於各種大學的學術研究也直接起源於中世紀的修道院。「修道士在修道院裏從事各種《聖經》和非《聖經》書籍和手稿的翻譯和抄寫工作，他們經常會將抄寫翻譯的有不同來源的版本進行比較和討論。這可以從現存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聖經》以及非《聖經》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證據。這種與研究相關的活動在大學裏得到延續，因為現在的教授也通過不同的圖書資源來編寫講稿。」³⁵這種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就是經院哲學，經院哲學對巴黎大學的誕生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儘管修道院教育為中世紀大學的出現準備了一切條件，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世紀大學的真正出現卻是在修道院教育衰落之後。「如果沒有從九世紀到十四世紀教育方面的進步，中世紀後期哲學和科學的許多成就是不可能的。由於加洛林學術復興，在西歐的一些修道院裏建立了比較好的學校和圖書館。但是，在九世紀的混亂中，許多這樣的機構被毀壞了。十一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使得修道院忽視了教育，結果存活下來的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相比，日益相形見绌。一些大教堂學校後來的發展相當於學院，在所謂的文科方面提供很好的教育。但是中世紀教育最重要的發展是大學的產生。」³⁶

從西元十世紀開始，中世紀的大學在西歐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也許薩萊諾是最古老的大學，從十世紀起它就是醫學學習的中心。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和巴黎大學也是十分古老的大學，前者大約建於1150年，後者於十二世紀快終結時才建成。牛津、劍橋、蒙比利埃、薩拉曼卡和那不勒斯等著名院校的歷史僅次於以上幾所大學。日爾曼直到十四世紀才有大學，在布拉格、維也納、海德堡和科隆出現了類似的學校。到中世紀末期西歐已經建立起八十多所大學。」³⁷

四 中世紀大學的現代轉型

中世紀大學的產生首先應該歸功於商人階層和獨立自治的新型城市的出現，而商人階層和獨立自治的新型城市出現的根本原因又在於中世紀歐洲經濟的復蘇和人口的增長。因此，歐洲社會產生了對高級人才的需求。大學則為滿足這種需求而應運而生。佛羅斯特說：「當修道院放棄教學轉向祈禱和反省隱居生活後，大的教會加強他們的學校來彌補這個理智的空白。當歐洲在教會下處於和平、繁榮和一致的時候，這些組織能吸引學者和學生來此，訓練年輕人，用以補充他們擴大的教職員。其結果是很多人口的中心都有有名的教學社團。他們的名聲吸引了其他學者和學生，於是這樣社團發展起來。漸漸地學者和學生們組織成行會和集團，於是，大學的雛形形成了。」³⁸這裏說的「很多人口的中心」就指的是歐洲中世紀出現的獨立自治的新型城市。

中世紀的大學就是這樣由教學社團發展而來。最初，大學並沒有固定的教學場所，也沒有固

定的課程，甚至沒有固定的教師和學生。一切以需求和滿足需求而決定。正如馬文·佩里主編的《西方文明史》所指出的那樣：「最早的大學並非有計劃地建設起來的，而是自發形成的。當渴望求知的學生集中於某些傑出的學者周圍時，大學便產生了。」³⁹這從詞源學上也可以得到解釋。歐洲中世紀教育通行的是拉丁語。因此，中世紀大學最初的稱呼也是拉丁文，有兩個：一個是studium generale，另一個是universitas。開始的時候，這兩個詞的意義有差別：studium generale是指一個接受來自各地的學生的場所，而universitas則是指一種從事教學的學術性的社團。很明顯，一所大學不能沒有學生，但更不能沒有教師。因此，隨著大學的組織結構愈來愈穩定，愈來愈制度化，這兩個詞逐漸合一，並被更為簡練的「university」所代替。這個演變過程大約經歷了兩、三百年的時間，與中世紀大學從最初產生到大體定型的時間差不多。

關於早期的中世紀大學，美國學者布魯斯·雪萊有一段非常生動形象的描述：「在聽到『大學』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想像到常青藤遍布的小山和青草幽幽的庭院。但中世紀大學甚至連永久的住房的影子都沒有。最初，講演是在牛津和劍橋路邊的棚子裏，在巴黎大教堂的回廊裏，在義大利的廣場上舉行。教師租借房間，學生席地而坐，通常地上鋪上防潮的稻草。因為沒有運動館、圖書館和其他設施的限制，如果大學發現自己與當地居民發生矛盾，可以隨時打點行裝，遷移別處。」⁴⁰

一般認為，中世紀大學有兩種模式，一種可以義大利的波隆那大學為例。簡單地說，這種大學的特點是以學生為中心，是學生交錢來僱用教師，因而在管理上也以學生為主。「兩位學生校長是大學的最高管理者以及大學制定的各項法律和規定的執行者。他們輪流管理大學的行政、司法和教學等事務，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代表大學擁有司法權。學生校長的行為不但受所在城市法律的約束，有權對本民族團以及整個大學的行政事務進行管理，特別是擁有司法裁定權，而且有權僱傭教師，規定教師的報酬。有關資料表明，到十四世紀末，學生幾乎完全控制了波隆那大學的管理，例如，受學生民族團僱傭的教師必須在民族團首領面前宣誓，表示絕對服從學生民族團的管理。各分民族團的首領學督和兩位學生校長組成大學委員會，對校長進行監督並對大學管理活動提出諮詢意見。不過大學的最高管理機構是由全體學生參加的大學全體會議，負責制定有關大學的重大的規章制度。」⁴¹這種在今天聽起來仿佛是天方夜譚式的大學管理方式雖然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歐洲南部的一些商業活動中心具有普遍性，但畢竟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因此，在這些特殊的歷史條件消失以後，這種管理方式也就不存在了。

另一種則以法國的巴黎大學為典型。這種大學以教師，通常是中世紀的著名學者為中心。例如，中世紀富有盛名的法國經院哲學家彼得·阿伯拉爾就曾經為巴黎大學的建立作出過重大貢獻。法國學者雅克·勒戈夫甚至認為：「就十二世紀的新時代範圍來說，他（——指彼得·阿伯拉爾——筆者注）是第一個偉大新時代的知識份子，第一個教授。」⁴²

巴黎大學是由巴黎聖母院的附屬學校發展演變而來。「巴黎大學的教務主要是由受教會控制的校長和教師們決定的。由校長負責的教師公會經過鬥爭，取得了原本屬於主教許可權的諸如對學校的教學管理、教師資格認可、教學程式安排、司法裁判、生活管理方面的事務的獨立管理權，因而有『先生大學』或『教師大學』之稱。教師們按照授課專業分成不同學院，通常有文學（又稱藝術）學院、神學學院、法學學院、醫學學院。院長由教師選舉產生，學校由院長聯席會議共同管理，逐漸地，某一傑出人物成為大學校長。學生人數最多的是文學院，他們按照民族或國家組成分會，每個分會都由一名學監管理。在中世紀，特別是十三—十

四世紀，巴黎大學是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學術機構，國際神學、哲學研究中心，著名的經院學家大多出自這裏。」⁴³

中世紀大學與誕生它的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的繼承性主要是在精神文化上和學術傳承上，尤其是體現在教學課程和教學方法上；而它們與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的最大區別則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是中世紀大學具有國際性。這裏所謂的國際性是指，早期中世紀大學一般都沒有特定的國別，因而其招生範圍也沒有國別的限制，教師和學生在各個大學之間的流動也相當自由。這主要是因為中世紀大學誕生的初期，歐洲的民族國家也剛剛開始形成；而且由於大學的數量太少，供過於求，同時也由於入學的門檻很低——幾乎是沒有任何限制，因而像波隆那大學和巴黎大學這樣的學校，它們的學生來自於西歐的各個角落。但是隨著民族國家的日益成熟和大學數量的日益增加，這種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大學數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廢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學在國際範圍內的招生，無論如何它是破壞了到那時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學多民族體系，這個多民族體系常常是大學結構中的主要特點。」⁴⁴

第二是學位制度的形成。儘管學位的起源可能非常古老，但學位制度的形成，並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卻是以中世紀的大學為起點。學位制度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大學教師的資格問題，至於成為一種區別知識層次的標誌和一種榮譽頭銜，則是後來的事情。最早實行學位制度的是義大利和法國的中世紀大學，大約是在13世紀初，當時，三個學位，即學士、碩士和博士之間沒有明確的層級區別和相互銜接關係。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按照巴黎大學的模式創辦起來的，並從巴黎大學引入了學位概念。但是在牛津和劍橋，只有獲得了學士學位的人才有可能向更高級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發起衝擊；而要獲得博士學位，則又必須先完成碩士學位的課程。十六世紀，英國的學位制度移植到美國；而美國在十九世紀以後建立起研究生教育，並把它和學位制度掛鉤，從而使學士、碩士和博士的三級學位制度趨於成熟，成為各國仿效的對象。

第三是學科的初步劃分。由於中世紀的大學最初都是為了滿足職業需求而創辦的，而各個不同的大學則具有不同的辦學優勢。因此，最早的學科劃分是按照職業的不同在各個大學之間進行的。薩萊諾的醫學傳統直接繼承於古希臘，而波隆那則是歐洲最著名的羅馬法研究中心；由於教宗和教會的垂青，巴黎大學在神學研究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至於文學，那是從事專業學習的必備基礎，自成一格。這就形成了中世紀大學最早的四大專業，即文學、神學、法學和醫學。今天的大學，學科的劃分愈來愈精細，但其基礎則是由中世紀大學所奠定的。

第四是實驗性的學術研究。儘管在修道院裏已經有了學術研究，但真正具有科學性質的實驗性研究還是開啟於中世紀的大學。例如，今天醫學研究普遍使用的屍體解剖，就開始於中世紀的波隆那大學。1300年，為了法庭辯論的需要，波隆那大學解剖了一具屍體；這種做法被傳到那些以醫學為專業的大學裏，從而形成風氣，一直被延續到今天⁴⁵。

最後，由於基督教會在歐洲中世紀文化上的統治地位，除很少的例外，中世紀的大學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教會的控制，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控制，都必須開設神學方面的課程；而大學的教師也大多數都是傳教士或基督徒。但是，教會、世俗君主與新型的獨立自治城市的三足鼎立為中世紀大學的發展提供了生存空間。正是利用這種形勢，在與教會，與世俗君主以及與自治城市當局的摩擦和鬥爭中，中世紀大學為自己爭得了獨立自治權，並為後世的大學留

下了自治傳統。

在後來一些世紀中，隨著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在歐洲相繼展開，中世紀的大學也相繼開始了向現代大學轉型的艱苦歷程。這既是一個完全擺脫教會控制的徹底世俗化的過程，又是一個由於民族國家日益成熟、強大而民族化的過程，還是一個由於科學技術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科學化的過程。在這個近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些大學保存下來了，但是更多的中世紀大學卻被淘汰了，而且即使保留下來的那些大學也已經面目全非，以致於我們在今天的大多數大學身上已經完全看不到中世紀大學的影子。但是，「大學在中世紀起著重要作用，學生們養成了說理辯論的習慣。大學培養職業書記、律師，他們管理教會和國家事務；這些學術機關同時也培養哲學家和神學家，這些人營造公眾輿論的氣氛。大學傳授的學問拉緊了聯繫整個歐洲基督教文化的紐帶，並且形成了不朽的學術傳統；今日我們的大學是中世紀大學發展的直接繼續。」⁴⁶

經過上文的梳理，《聖經》與現代大學教育的歷史淵源已經清晰可見。誠然，我們在《聖經》本身的文本中也許讀不到有關現代大學教育的文字，但是，通過基督教會，通過希臘化時期的教義問答學校、中世紀的修道院學校和大教堂學校，以及現代大學教育的直接先驅——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上帝和耶穌——無論你是否確信它們的存在——還是在我們今天的大學身上留下了自己不可磨滅的印記，而不管你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

主要參考文獻

- 1 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irst published 1997.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2 聖經（舊約，新約，現代中文譯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1997
- 3 台灣出版非賣品《聖經》（新約附詩篇、箴言，精裝本）
- 4 威利斯頓·沃爾克（美） 基督教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6月1版1刷
- 5 蔡（言永）春 新約導讀，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1版1刷
- 6 劉意青 《聖經》的文學闡釋——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1版1刷
- 7 黃陵淪 猶太教學，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1版1刷
- 8 歐尼斯特·勒南（法） 耶穌的一生，商務印書館，1999年8月1版1刷
- 9 楊慧林 聖言·人言——神學解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3月1版1刷
- 10 埃裏克·夏普（英） 比較宗教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1版1刷
- 11 托倫斯（英） 神學的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1版1刷
- 12 維爾納·克勒爾（德） 聖經：一部歷史，三聯書店（北京），1998年10月1版1刷
- 13 徐懷啟 古代基督教會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1版1刷
- 14 凱倫·阿姆斯壯（英） 神的歷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11月1版1刷
- 15 希歐多爾·加斯特（美） 死海古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10月1版1刷
- 16 大衛·羅爾（英） 聖經——從神話到歷史，作家出版社，2000年8月1版1刷
- 17 大衛·羅爾（英） 傳說——文明的起源，作家出版社，2000年4月1版1刷

- 18 何光滬 許志偉主編 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7月1版1刷
- 19 高國藩 中國巫術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11月1版1刷
- 20 黃樸民 天人合一——董仲舒與漢代儒學思潮，嶽麓書社，1999年3月1版1刷
- 21 林 端 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巨流圖書公司（台北），1994年1月1版1刷
- 22 博伊德 金（英） 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1版，1986年11月1刷
- 23 羅秉祥 江丕盛 基督宗教思想與此無關1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版1刷
- 24 文 庸 聖經蠡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1版1刷
- 25 克里斯多夫·道森 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版，1992年6月3刷
- 26 毛麗姬 天堂地獄：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1版1刷
- 27 雅克·勒戈夫（法） 中世紀的知識份子，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1版，1999年4月2刷
- 28 布魯斯·雪萊（美） 基督教會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1刷
- 29 阿爾文·斯密特（美） 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1版1刷
- 30 S·佛羅斯特（美） 西方教育的歷史和哲學基礎，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1版1刷
- 31 張慶熊 基督教神學範疇——歷史的和文化比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1版1刷
- 32 馬文·佩里主編 默·蔡斯 詹·雅各 瑪·雅各 西·馮·勞（美）合編 西方文明史（上下），商務印書館，1993年9月1版1刷
- 33 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 菲利浦·李·拉爾夫（美） 世界文明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1月1版，1990年4月2刷，1-4卷
- 34 張延玲 隆 仁主編 世界通史，南方出版社，2000年2月1版1刷，1-6卷
- 35 劉寶存：大學理念的傳統與變革，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7月1版1刷
- 36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2月1版1刷
- 37 克拉克·科爾（美）：大學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1刷
- 38 章雪富 聖經和希臘主義的雙重視野：奧利金其人及神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4月1版1刷
- 39 張俊宗：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回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5月1版1刷
- 40 沈 紅：美國研究型大學形成與發展，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1版，2004年2月3刷
- 41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美）：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2003年11月3刷
- 42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1版1刷
- 43 黃福濤主編：外國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刷
- 44 《外國教育叢書》編輯組：六國著名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1版，1980年7月2刷
- 45 伯頓·克拉克（美）：學術權力——七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比較，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1版，2001年12月2版2刷
- 46 彼得·紮格爾（德）：牛津——歷史和文化，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刷
- 47 彼得·紮格爾（德）：劍橋——歷史和文化，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刷
- 48 何懷宏編：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

- 1 S·E·佛羅斯特（美）：西方教育的歷史和哲學基礎，華夏出版社，1987年11月1版1刷，第3頁。
- 2 同上書，第18頁。
- 3 一般認為，「基督教」一詞在漢語語境中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包括所有教派在內的、以耶穌基督命名的宗教總體，也被稱之為基督宗教；另一含義則專指這個宗教中的「新教」一派。本文在第一種含義上使用「基督教」一詞。
- 4 羅馬天主教的《聖經》正典還包括《次經》七卷。此外，還有各種各樣不被列入正典的聖經著作。
- 5 同注1，第37頁。即使在今天，宗教仍然在猶太人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而不管他們住在哪兒。
- 6 同上，第27頁。
- 7 黃陵渝在《猶太教學》中寫道：「在人類歷史上，猶太人一直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民族。這個有著4000多年歷史的民族，曾有近2000年的流散史。自西元70年起，這個民族失去了祖國，一次又一次地被驅散到世界各地，受盡侮辱、迫害；在百忙之中0世紀30-40年代又遭到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劫難，600萬同胞死于德國法西斯的屠刀下。然而，這個民族卻頑強地生存下來，以自己珍貴的文化精神支柱猶太教——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一神教——維繫、振奮著整個民族，使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黃陵渝：猶太教學，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1版1刷，第8頁。
- 8 同注1，第30頁。
- 9 同上，第36頁。
- 10 同上，第39頁。
- 11 同上，第41頁。
- 12 同上，第42-43頁。
- 13 阿利斯特·麥格拉思：基督教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1版1刷，第249頁。
- 14 阿爾文·施密特：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1版1刷，152頁。
- 15 博伊德·金（英）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1版，1986年11月1刷，第55-61頁。
- 16 同注1，第120-121頁。
- 17 同注15，第84頁。
- 18 克里斯多夫·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版，1992年6月3刷，第40頁。
- 19 布魯斯·雪萊（美）：基督教會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1刷，第127頁。
- 20 據《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9章第21節記載，耶穌曾對一位青年財主說：「如果你要達到更完全的地步，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你就會有財富積存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可是這位青年財主聽了耶穌的話以後，卻垂頭喪氣地走了，使耶穌很失望，感歎地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有錢人要成為天國的子民多難哪！我再告訴你們，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在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關章節中也都有相同的記載。
- 21 同注1，第128頁。
- 22 同注18，第130頁。
- 23 不同版本的書上對這個名字有不同的譯法，其實說的都是同一個人。由於翻譯的關係，類似的情況屢屢出現。在本文中，凡屬這種情況，無論出自何書，皆統一為一種，而且不再加以說明。
- 24 同注1，第129頁。

- 25 同注18，第131頁。
- 26 馬文·里主編，默·蔡斯、詹·雅各、瑪·雅各、西·馮·勞（美）合編：西方文明史（上），商務印書館，1993年9月1版1刷，第265頁。
- 27 毛麗姬：天堂地獄：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1版1刷，第206頁。
- 28 同注18，第207頁。
- 29 同上，第134頁。
- 30 同上，第133頁。
- 31 同上注。
- 32 同注14，第169頁。
- 33 同注1，第132-133頁。就在引文以下的篇幅裏，佛羅斯特還詳細描述了修道院圖書館建立的歷史過程：「抄寫間是大多數修道院的一個特徵。它是一所大房間，設有擺著筆墨紙張的書桌。每張書桌後都坐著一個有一定書寫技巧的修士。坐在桌邊上的一個修士大聲念著一本書，其他人把它抄寫下來。讀寫完成後，修道院就有了這本書的一些抄寫本，可用來交換其他修道院的另外一些抄寫本。通過這種方法，圖書館成立起來了，書籍也在當時的文化中普遍得到使用。」
- 34 同注26，第206頁。
- 35 同注14，第170頁。
- 36 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利浦·李·拉爾夫（美）：世界文明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1月1版，1990年4月2刷，第2卷，第64頁。
- 37 同上注，第64-65頁。
- 38 同注1，第161頁。
- 39 同注36，第320頁。
- 40 同注19，第219頁。
- 41 黃福濤主編：外國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刷，第77頁。
- 42 雅克·勒戈夫（法）：中世紀的知識份子，商務印書館，1996年12月1版，1999年4月2刷，第31頁。
- 43 同注27，第216-217頁。
- 44 同注42，第125頁。
- 45 參見注14，第172頁。
- 46 同注26，第321頁。

姚禮明 北京大學副教授，中國管理科學院院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四期 2005年1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四期（2005年11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